

新區域主義下的東南亞國協經貿整合： 以服務貿易自由化為核心

張愷致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助理教授

謝笠天

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摘要

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以及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的締結，促成了全球貿易的自由化以及國際產業供應鏈的重整。然而，伴隨國際貿易自由化而產生的國際財富分配不均，以及發展中國家未能因貿易自由化獲益的問題，亦導致發展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之齟齬日漸加深。開發中國家因此擔憂國際貿易的自由化不但無法幫助其實現脫貧的目標，更可能如國際政治經濟學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所描述，導致發展中國家成為已開發國家經濟成長的墊腳石。

本文主張，自2000年後興起的第三波區域整合（Third Regionalism）中，大量締結的自由貿易協定，撼動了過往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心的國際貿易架構。發展中國家在此階段大量締結的自由貿易協定，修正了過往區域整合由已開發國家主導態樣，並讓發展中國家在區域整合甚或是巨型貿易協定的談判中，擁有更大的影響力。本文透過對東南亞國協在東協經濟體2025藍圖下對服務業貿易整合策略之分析，說明發展中國家在第三波區

域整合中發展出的新區域主義，並解釋東南亞國協如何透過多元且富有彈性的整合模式，漸進式的讓發展中國家擴大其貿易開放承諾，在深化區域經貿整合的同時，降低貿易自由化對國內政治、經濟及社會之衝擊，兼顧開發中國家透過貿易促進發展之需求以及期待。

關鍵詞：新區域主義、依賴理論、自由貿易協定、東南亞國協、區域整合

* * *

壹、緒論

1995年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TO），在全球經貿體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WTO除了擔負促進各國進行經貿談判以及建置新貿易規則的功能外，WTO貿易政策監督（亦稱透明化）機制下對各成員國貿易政策的檢視，也有助於減少貿易障礙。此外，WTO具有強制管轄權的爭端解決機制，也提供了成員國面對貿易爭端的準司法救濟途徑，並有助於成員國依「規則」而非「力量」解決彼此間之爭端。

WTO規則已成為全球多邊貿易制度的骨幹，且對促進全球貿易自由發展有顯著貢獻。但隨著WTO談判在杜哈回合談判後陷入停滯，其貿易政策監督以及爭端解決等功能，也在運作上遭遇困難或受到會員質疑，WTO及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對貿易的主導地位，已逐漸受到挑戰。相較於WTO多邊貿易體系近年面臨的困境，雙邊及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簡稱：FTA）在同期間則迅速發展，並在多邊貿易體系停滯期間，持續發展新規則，並對國際貿易的自由化以及消除貿易障礙做出貢獻。

在近年締結或正進行談判的區域貿易協定中，又以將完成泛太平洋整合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CPTPP），以及促成亞洲區域經貿整合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

RCEP）等巨型區域貿易協定（mega-regional FTAs）最受矚目¹。這些巨型區域貿易協定除了因覆蓋經濟體規模龐大而受矚目外，其針對政府控制事業、勞動、環境以及中小企業等新貿易議題所制訂的規範及條款，也都被認為可能影響未來多邊貿易談判方向，且對國際貿易規範發展具重要的指標性意義。

傳統上，重要貿易協定和區域貿易整合計畫，主要是由北美、歐洲、日本和澳洲等經濟發達的北方世界國家（Global North Country）所推動，其所反映的也主要是經濟發達國家對區域整合之策略和期待。相對的，對貿易自由化較謹慎的南方世界國家（Global South Country），其對於區域經貿整合及FTA簽署之政策，則較容易被學界所忽略，甚至被認為南方世界國家對區域經貿整合採取消極之態度。

事實上，雖然南方世界國家近二十年間所締結的FTA，在規模上或許無法和CPTPP等巨型貿易協定相比擬，但南方世界國家間締結的FTA不論在簽署數量、貿易覆蓋範圍，抑或是其市場開放程度，均不亞於前述之巨型自由貿易協定。倘若在研究時忽略了南方世界國家近年在推動區域整合努力及成果，此時自將因疏漏南方世界國家對當前國際經貿秩序建構之影響，而無法全面性了解當前區域經貿整合之趨勢及特徵。

本文作者主張，在2000年後開始的第三波區域整合（Third Regionalism）中，除了北方世界國家所主導的巨型區域貿易協定外，南方世界國家所推動的區域經貿整合及FTA締結，形塑了以南方世界國家需求為本的新區域經貿秩序（New Regional Economic Order）。相較於1970年代發展，強調經濟較發達國家負有協助南方世界國家發展義務，並應讓南方世界國家享有更多貿易優惠，使之得以透過貿易而獲得發展的新國際經濟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南方世界國家在第三波區域整合建立的新區域經濟秩序，並不強調北方世界國家提供之協助，而是著重於利用南方世界國家之合作。使南方世界國家互相開放市場並整合生產資源，進而得降低對北方世界國家市場和技術之

¹ 除了CPTPP和RCEP外，目前另有將完成泛大西洋整合之「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而重整北美經濟體貿易規則的「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貿易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等。

依賴，減少和北方世界國家合作時常面臨的市場開放壓力。以維護國家對貿易之規範主權，亦有助於避免南方世界國家在全球經貿動盪時可能受到的衝擊。

南方世界國家在第三波區域整合實行的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以多元且富有彈性的整合策略推行區域整合，促進區域內跨境服務業貿易以及商業投資，整合區域內勞動生產資源，並擴大區域市場規模。即便是在政治及經濟上具高度爭議性及敏感性的服務業貿易，南方世界國家仍能利用漸進式整合策略，說服成員國進行開放。南方世界國家在第三波區域整合中扮演的角色，其對於平衡國家主權以及貿易自由化間衝突的處理，以及其推動區域整合所採取之策略，對於國際經貿法以及區域整合之研究，均有重要之影響和可參考性。

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以下簡稱：ASEAN或東協）自1961年創立以來，功能已從冷戰時期維護區域軍事安全及政治穩定，逐漸轉變為促進並推動區域經貿合作，成員國也從原本的四國成長為目前的十國²。雖然東協成員國主要為開發中國家，但東協整體經貿發展快速，自2000年以來區域經濟平均成長率超過5%，在2018年更已是全球第五大經濟體（ASEAN 2018, 27）。東協除了因區域經濟發展快速而受到矚目外，其目前也是各國積極爭取合作的對象，並是亞太區域經貿整合的主要推手。其中，臺灣自2016年開始推動的新南向政策，即著重於深化與東協各國國家發展經貿關係，強化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連結及合作。在亞太地區的區域經貿整合中，東協不論對集團內經濟體的整合，又或是以推動亞洲區域經貿整合的RCEP談判與締結，均扮演著核心推動者之重要角色。

著眼於東協由南方世界國家組成之特性，其在全球和區域經貿整合之重要角色，以及東協在推行區域經貿整合之豐富經驗，本文以東協區域經貿整合為研究範例，探究南方世界國家間之經貿整合態樣及策略，並將聚焦於東協自2007年開始籌建之東南亞國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簡稱AEC 或東協經濟共同體），推動服務業貿易整合及開放採行之策略，藉以

² 正式會員包括：印尼、越南、寮國、汶萊、泰國、緬甸、菲律賓、柬埔寨、新加坡、馬來西亞。除正式會員外，另有巴布亞紐幾內亞為觀察員。

探討東協各成員國如何在推動貿易自由化的同時，兼顧並平衡發展中國家之「發展」需求，並降低各國對貿易自由化侵蝕國家主權之擔憂。本文希透過對東協經貿整合模式和策略研析，凸顯南方世界國家間區域貿易協定對整體國際貿易規範制度形塑之意義及貢獻，提供對當前國際貿易規範多軸發展不同面向觀察。並分析南方世界國家採行之新區域主義，對解決南方和北方世界國家衝突之可能助益，以及將其用以解決多邊體系下貿易與發展之平衡問題之可能。

本文分為五節鋪陳論述，第二節將說明國際貿易中推動貿易自由化與促進各國發展之關係，並將簡介多邊貿易體系中，為了因應各國發展程度歧異而訂定的特別與差別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以下簡稱：SDT）機制，以及因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和低度開發國家（統稱為發展中國家）無法就推動貿易自由化與維護發展權利間取得平衡，所導致WTO杜哈回合談判之停滯及失敗。第三節介紹自九零年代後期所形成的區域貿易整合趨勢，並將側重於說明南方世界國家間貿易協定，在此區域整合過程中扮演之角色，以及東南亞國協之經貿整合歷程及目標。此部分將涵蓋東協1967年成立後至最新的東協經濟體2025藍圖（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以下簡稱：AEC 2025藍圖）之介紹。第四節以東協經濟體服務業貿易開放為核心，介紹東協為了平衡區域內不同經濟發展程度國家對貿易及發展需求，而採行的多元整合策略，以及東協當前推動區域內自然人跨境移動的經貿整合成效，最後則將探討東協當前服務業貿易整合策略未來可能面對之隱憂和問題，並在第五節總結。

貳、多邊經貿整合下的貿易與發展衝突

自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建立以來，國際社會即戮力於協助發展中國家脫離貧窮。雖然由富庶國家提供貧窮國基金錢或物質援助，看似能直接協助發展中國家的貧窮問題，但經濟學理論以及現實實踐卻顯示，協助發展中國家發展國際貿易，才是能實質幫助發展中國家社會和經濟發展，且能有效協助發展中國家脫離貧窮的方法（Matsushita et al. 2015, 714; Oxfam 2002, 48）。也因此，目前不論是聯合國又或是世界貿易組織，均希望透過促

進發展中國家貿易發展，減少國家之貧窮問題，並希望透過國際貿易而降低全球的貧窮人口數量（Joseph 2011, 142; Howse 2004）。在WTO的馬拉喀什協定（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前言中，即特別將「提高生活平、確保充分就業和大量且穩定成長的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列為WTO欲透過發展貿易而實現的目標。

雖然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國際貿易有助於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但在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情況下，各國對於國際貿易的期待，以及所能承受的市場自由化競爭衝擊也不盡相同。在以已開發國家為主的北方世界國家觀點中，其認為國際貿易的重點在於提升市場開放、消弭關稅和非關稅貿易障礙，並應透過落實最惠國以及國民待遇原則，強化對各國市場以及生產要素之整合，進而極大化國際貿易利益，並減少因關稅及非關稅貿易障礙所造成的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相對的，由發展中國家為主組成的南方世界國家集團，則強調應落實1974年聯合國大會的新國際經濟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NIEO）決議。認為應在尊重各國國家主權獨立及完整性的前提下，修正國際經貿體系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待遇，並給予發展中國家財政以及技術上的支持性協助（affirmative action），以促進其經貿及社會發展（Hudec 1987, 101-102）。

南方世界國家所強調的新國際經濟秩序概念，在九零年代期間因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而逐漸沒落，並因為美國和歐洲國家在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下提倡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而受到消蝕（Cypher 2014, 238; Rolland 2012, 51; Williamson 2008, 16-17）。但過往十數年的努力，仍讓南方世界國家強調應平衡貿易與發展的目標，部分地反應在國際貿易規則中。其中，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以下簡稱：GATT）東京回合（Tokyo Round）以及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談判中，GATT締約國將SDT條款納於WTO協定中，給予發展中國家各式履約優惠，以及技術上協助和輔導，藉以調和發展中國家加入WTO後可能受到的衝擊及影響。

一、SDT條款之闕漏與多邊體系下貿易與發展的矛盾

WTO多邊貿易規則在談判之初，即已將南方世界國家強調的「發展」需求納入考量。其中SDT機制給予發展中國家履行WTO義務時更大的彈性、更長的降稅期程和調適期，以及要求已開發國家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優惠以及技術協助（Roessler 1998, 519-520; Hoekman 2005, 406; Hunter 2003, 315），均是多邊貿易體系協助南方國家藉貿易發展之例證。此外，WTO下授權條款（Enabling Clause）所創設的最惠國待遇例外（Mossner 2014; Choi and Lee 2012; Yusuf 1980, 492; Mason 2004），也讓已開發國家可和發展中國家簽署優惠性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而促進其經貿發展，協助其融入多邊貿易體系（Finger and Winters 1998, 365-392; Bartels 2003, 511）。

WTO之SDT條款雖看似提供南方世界國家多元且富有彈性之優惠，但在實踐上，其卻與發展中國家之期待有著相當之差距（Ewelukwa 2003, 858-864）。此外，隨著部分發展中國家加入WTO後，其國內經貿不但未能如預期般成長，甚至出現衰退現象，此也導致部分發展中國家認為WTO規範片面保障已開發國家利益，甚至有剝削發展中國家之問題。（Goldsmith 2001, 253-266; Bauer 1981, 76-80）。

首先，WTO協定中多數SDT條款，固然要求成員國注意並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的優惠，但這些條款在協定中，卻多是以「盡可能（shall if possible）」或應「盡最大努力（best endeavor）」等軟法（soft law）性質文字呈現。而未使用更強烈且具有法律上拘束力的「應當（shall）」字語，課予已開發國家履行之義務（Olivares 2001, 72）。換句話說，雖然已開發國家在SDT條款下承諾協助發展中國家進行發展，但當這樣的概念轉換到實際的條文文字時，協定卻只載明已開發國家「被鼓勵」提供發展中國家協助，但未課與已開發國家任何實質且具有強制性的義務（Lichtenbaum 2002, 1012）。在WTO協定未明文課予已開發國家協助發展中國家義務之狀況下，發展中國家自然沒有要求已開發國家給予其協助或優惠之積極性權利，只能被動的接受他國之給予，甚至是施捨性的優惠。

其次，雖然已開發國家在SDT機制下，可利用授權條款下之普遍優惠制度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以下簡稱：GSP），例外地排除最惠國待遇之適用並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優惠的市場進入條件。然而，此些優惠條件的授予與否，單方取決於授予國（已開發國家）之決定，且授予國對於授予優惠之對象、授予之利益內容、授予利益之多寡，甚或是所受與利益之附加條件，均有廣泛的裁量權（Michalopoulos 2000, 11）。此種讓授予國可單方面決定授予利益對象及條件之制度設計，除了可能導致各國因所獲得利益不同，而出現差別性和不公平待遇之問題外（Michalopoulos 2000, 11; Carl 2001, 86）。甚至會讓已開發國家得藉此對發展中國家施壓，甚至是取得對發展中國家之政治或經濟上控制力，進而弱化發展中國家之地位和自主性（Islam 1999, 443）。

此外，考量在*European Communities — Conditions for the Granting of Tariff Preferenc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案（以下簡稱EC – GSP案）後，WTO上訴機構要求援引授權條款而訂定之FTA，仍須符合非歧視性待遇原則，且要求已開發國家設置的GSP機制不得獨厚特定發展中國家，導致已開發國家利用GSP機制授予開發中國家利益之裁量權和彈性受到限縮。因此在EC – GSP案後，已開發國家亦開始縮減對GSP制度的利用，此最終也導致了SDT機制效用的縮減（Dhar and Majumdar 2010, 204; Gruszczynski 2008, 235）。

再者，雖然發展中國家加入WTO後，可享有較長之調適期間以及降稅期程，但因發展中國家所得享有的調適期長短，並非依其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等客觀條件決定，而是由其他成員國進行判斷（Lichtenbaum 2002, 1019）。此種制度設計也導致當發展中國家因實質困難而無法在時限內完成調適時，其往往難以獲得其他會員的同意而延長調適期限。此外，考量WTO烏拉圭回合談判後，WTO成員國間之貿易關稅已大幅降低，且各國也多改利用非關稅措施作為干預貿易之手段（Michalopoulos 2000, 10），這也導致SDT機制讓發展中國家享有較優惠關稅之實質利益，已不若過去各國普遍採行高關稅時般顯著及有利（Whalley 1999, 26）。

WTO推行的貿易自由化，固然對整體國際貿易發展具有正面意義（Tomz et al. 2007, 2016-2018; Subramanian and Wei 2007; Rose 2004, 102-105），但伴隨WTO運作而產生的國際財富重新分配，以及財富分配不均狀況，卻也同樣受人詬病（Kulovesi 2011, 26-27; Bohne 2010, 163）。根據Jawara等學者研究

顯示，WTO制度下之受益者，主要集中於已開發以及經濟高度發展國家，相對的，為了加入WTO而蒙受極大產業及社會衝擊的發展中國家，在加入WTO後卻僅獲得有限的經濟成長（Jawara and Kwa 2003, 269; Subramanian and Wei 2007; Chang and Lee 2011）。這也導致發展中國家對WTO之功能及角色，以及對WTO所提倡之自由貿易及開放競爭策略是否是發展中國家尋求經濟發展最佳取徑，或者僅是包著糖衣的毒藥產生質疑（Chang 2009）。

二、多邊經貿體系發展的停滯與危機

WTO多邊貿易體系無法有效回應各國發展需求所產生的社會矛盾和衝突問題，反映在1999年以來WTO新回合談判的場外社會抗爭（Broude 2007, 246-261），以及會場內成員國意見分歧而導致的新回合談判停滯（Schott 2000, 5）。

在2001年WTO第四次部長會議後開展的新回合談判期間（Doha Development Round，以下簡稱：杜哈回合），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南方世界國家，即特別關注於貿易與發展之平衡問題。在會場中，發展中國家除了透過提案及參與討論，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之貿易優惠和履約彈性外（Haque 2002, 1098），發展中國家也希望能透過修正既有WTO規則，使之符合南方世界國家之發展需求（Watal 2000, 72-73; Panitchpakdi 2001, 429）。

在談判中，WTO成員國除了就發展中國家發展需求進行討論外，杜哈部長宣言也特別強調了發展中國家在農業、服務業貿易、非農產品市場進入、投資、競爭政策、政府採購、環境保護等議題之特別需求，並要求WTO協定應增訂技術合作和能力建構條款，協助發展中國家進行調適，並應藉既有SDT規則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的調適彈性，以減低新規範對發展中國家之衝擊（Pham 2004, 339）。

雖然南方世界國家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系之運作，強化了WTO的正當性以及合法性，但南方世界國家在談判中側重於協助發展中國家發展之立場，卻也導致WTO過往以北方世界國家提案為主的決策模式受到挑戰（Pham 2004, 337）。此外，由於北方世界國家和南方世界國家在經濟自由化、發展政策、分配正義，以及國家規制主權等議題意見分歧，各國對於SDT機制的運作認知

亦存在差距（Cho 2010, 594-595）。在無法有效化解各會員國分歧立場的狀況下，WTO的談判也因此陷入拉鋸及膠著（Finger 2002, 303-305; Biermann 2001, 421-422.），而前後歷經14年努力的杜哈回合談判，最終也在2015年的奈洛比部長會議中以宣告失敗收場（Martin and Mercurio 2017; Donnan 2015; Cho 2010, 587-601; Emmert 2003, 98-99）。

杜哈回合的停滯，使WTO促進貿易談判的功能蒙上了陰影。然而，WTO除了談判功能外，其在貿易政策監督以及爭端解決機制面相的運作，也因成員國未能貫徹履行義務，以及成員國對爭端解決功能的不同看法，以及爭端解決機制實際運作上之間題而面臨瓶頸（Lee 2017; Cao 2019）。隨著WTO運作上之間題不斷浮現，要求WTO進行改革的呼聲逐漸增高（Wilkinson 2018; Heidrich 2013; 189-212; Caporal 2018; Hoekman 2011），這也導致以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系，對國際貿易規範和運作的重要性及主導地位，也逐漸被同時期蓬勃發展的FTA所取代（Picker 2005, 300; Chen 2009; Kurihara 2011, 846; Pomfret 2007; Damro 2006, 23）。

三、國際關係影響下的國際經貿秩序發展

南方和北方世界國家在國際貿易場域的衝突及歧見，除了歸因於各國經貿發展差異以及貿易利益分配不均之間題外，各國對於貿易與發展關係的不同想像，也反映了國際關係理論對國際經貿秩序之影響。在現實主義（Realism）理論下，國家必須倚靠自生力量的強盛，方能確保其在國際社會中之生存。國家作為一個理性的國際社會參與者，自然也將透過追求力量的極大化以維護其利益（Shell 1996）。國家力量除了存在於軍事和武裝上，經濟及貿易實力的發展也同樣對國家安全具有外部性鞏固作用（Powell 1999; Grieco 1990）。因此在現實主義的解釋下，雖然WTO的成立和FTA的簽署，均有使國際貿易法制化而制約大國權力運用的效果（Ikenberry 2001, 50-51, 244），但總體而言，強權國家仍試圖透過其對貿易規則制定的影響力，營造一個有利於其最大化利益的制度環境（Krasner 1991）。從當前國際社會重商主義的盛行，各國在貿易談判中均力求將對自身有利規則納入的現象，以及已開發國家抗拒給予經濟較落後國家更多之扶持和履約彈性的狀況觀察，此均是現實主義對國家行

爲以及國際貿易體系形塑之影響。

雖然過往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爲，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將有助於各國依比較優勢進行生產，並能促使國際生產效率極大化而讓全球共同獲益。然而，此經濟學的理想在受現實主義影響的國際社會中，卻也因各國對利益極大化的追求而難以實現。其中，在觀察拉丁美洲國家受國際貿易影響的發展後，普雷維什（Raúl Prebisch）在1950年代即提出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認爲工業化以及貿易自由化之推動，不但無助於開發中或低度開發國家進行發展，其反而容易導致高度發展國家透過汲取發展程度較低國家的損失而累積財富（Prebisch 1962）。

根據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提出的中心／邊陲（Core-Periphery）理論，其也認爲掌控商業、工業和技術之中心國家，將因其工業和經濟實力優勢而成爲經濟發展之重心，但以出口原料、提供勞力密集服務爲主的發展中國家，則將因對已開發國家之依賴，而成爲受剝削的邊陲國家（Dos Santos 1970, 231-34）。換言之，在依賴理論學派學者的分析中，南方以及北方世界國家在經濟和政治實力上差異，終將導致在雙方進行國際貿易時處於不平等之地位，且此類國際貿易的推行，不但無助於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並獲得發展，其反而將使發展中國家對已發展國家形成依賴，使發展中國家陷於不利之地位（So 1990, 95-102）。

不論是現實主義強調國家追求力量及利益極大化的描述，又或是依賴主義下中心及邊陲國家之敘述，國家在國際貿易所呈現者，似乎是相互競爭而非合作之關係，更無所謂透過貿易而促進發展中國家發展之功能。此外，南方世界以及北方世界國家間在經濟、工業能力以及發展上的差異，以及兩陣營成員對於欲透過貿易達成目標之不同，也造成各國在貿易談判進行時，一方著重於推動貿易的自由化及開放，一方則強調促進發展的目標，導致談判最終陷入僵局。

面對南方世界以及北方世界國家相互競爭，以及因彼此對貿易發展目標有所不同而產生之問題，普雷維什主張發展中國家，應透過與發展程度相似國家進行合作及貿易，擴大市場並進而發展產業，使其能脫離對北方世界國家之依賴而獲得發展（Prebisch 1964, 18）。在國際經貿的發展現實中，不論是1970

年代興起的新國際經貿秩序，又或是2000年後開始的第三波區域經貿整合中出現的新區域經貿秩序，均是南方世界國家整合發展中國家力量，避免其成員陷入南、北陣營衝突泥淖而達成之合作實例。以下本文即以東南亞國協國家之經濟整合歷程為例，說明自第三波區域整合中新區域主義之特徵，以及在新區域經貿秩序下，南方世界國家對貿易自由化之革新及突破，以及東協為調和貿易自由化衝擊並促成各國合作所採取之措施。

參、新區域經濟秩序發展與東南亞的經濟整合

一、第三波區域整合及新區域經濟秩序發展

隨著雙邊及區域FTA的大量締結，當前國際經貿整合態樣已從過往以WTO為核心的多邊模式，轉為多邊和雙邊區域並進的發展模式。截至2019年3月15日，全球已生效的FTA總數已達302個，其數量已較1995年成長七倍有餘³。且隨著各國持續透過簽署FTA提升貿易競爭力並開拓市場，並利用CPTPP、USMCA、TTIP以及RCEP等巨型貿易協定，更大規模地整合區域經貿，當前FTA所覆蓋之貿易範圍，以及其在經貿規則制定中所扮演的重要性均不斷升高（Kurihara 2011; Pomfret 2007; Damro 2006）。

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全球已經歷三次的區域整合浪潮。其中，除了Bhagwati（1992）所指出分別發生於1960年代以及1980年代的區域整合外，本文認為，隨著2000年後大量FTA的簽訂，全球正經歷第三次區域整合階段（Hsieh 2017, 335-336），而南方世界國家的積極參與，更是此第三次區域整合與前二次區域整合的最大不同。

近代第一次區域經貿整合發生在1950年代，當時荷蘭、西德、比利時、盧森堡、法國以及義大利等六國，透過建立關稅同盟而消弭彼此間關稅貿易障礙，並在1967年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在同一時間，包含英國和葡萄牙等在內的七國家，也透過成立歐洲自由貿易協

³ 目前全球已向WTO通報且生效中的FTA數量統計，可參見WTO (2019)。

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促進區域貿易之進行（Craig and Búrca 2015, 3-6）。此一由歐洲國家領導的第一波區域經貿整合計畫，很快地引起非洲和中、南美洲地區發展中國家效尤，並興起了一波簽署FTA而刺激經貿發展的風潮。

雖然強調已開發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簽署FTA時，不應期待發展中國家能做出相同程度承諾的SDT原則，已在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的推動下逐漸獲得確立（Hoekman and Kostecki 2009, 535-536），且GATT成員在1979年通過的授權條款，亦允許各國利用GSP制度，例外地排除最惠國待遇之適用，並正當化已開發國家在FTA中給予發展中國家之特殊優惠措施。雖然在GSP下，發展中國家可差別性的享有已開發國家授予的優惠措施，但開發中國家在GSP制度下所得享有的利益，係單方由已開發國家進行決定，對發展中國家缺乏保障外，未授予發展中國家積極請求權的制度設計，亦讓已開發國家難以索要符合其需求之利益和優惠。此外，由於第一波區域整合階段簽署的貿易協定，始終無法有效提升區域內之貿易活動，因此除了歐洲共同體在成員國的努力下持續成長外，第一波區域貿易整合在1970年代期間迅速瓦解（Pomfret 2007, 924）。

第二波的區域經貿整合於1980年代再次興起，並於1993年NAFTA成立時達到顛峰。此階段除了北美地區的經貿整合外，早些成立之歐洲經濟共同體，也在1992年馬斯垂克條約簽署後，更名為歐洲共同體，並隨著歐洲執委會、理事會以及議會的設立，將其目標從既有的經濟整合，擴張為區域政治及經濟之複合式整合，且其成員數也擴增為15國。除此之外，澳紐緊密經濟關係協定、南美國家組成之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南亞自由貿易協定（SAFTA）及東協自由貿易協定（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簡稱：AFTA）之簽署，均是第二波階段區域經貿整合發展之例證（Mansfield and Milner 1999, 600-602; Sen 2006, 554; Switky 2000, 19）。

第二波區域經貿整合之特徵，與第一波區域經貿整合有諸多相似之處。首先，不論是第一或第二波區域經貿整合，其多半為經濟發達國家所主導，而其推動整合之目的，又特別著重於使區域內生產資源獲得合理配置，透過國際分工及合作而實現貿易利益的最大化之垂直分工。以NAFTA推動的區域整合

爲例，美國和加拿大的資金和技術及知識密集型產業，即可因貿易障礙的減少而擴大其對墨西哥市場之影響力及佔有率；相對的，墨西哥則可利用其充沛且低廉的生產勞動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將產品輸往美國及加拿大，並利用美、加之資金和技術移轉，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及轉型。其次，雖然在第二波區域經貿整合中，我們亦可發現到諸如MERCOSUR和東南亞國協等南方世界國家所成立的區域經貿整合計畫，但由於此階段的南方世界國家對貿易開放仍有顧忌，且未能充分消除關稅外之其他貿易障礙，南方世界國家間在第二波經貿整合之成效並不顯著（UNCTAD 2017, 31-36）。

第三波區域整合的興起，繫因於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亞洲國家對國際經濟組織的不信任。在亞洲金融風暴中，世界銀行以及國際貨幣組織等無法有效因應並保障區域經濟的穩定發展。因此，亞洲國家即希望透過推動區域經貿整合，強化區域經貿的穩定及健全，避免區域經濟受國際波動或外在威脅之影響（Pomfret 2007, 936; Abdel-Monem 2012）。此外，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勢崛起，東南亞區域國家爲了避免因各自國內市場經濟規模不足，無法與中國抗衡，導致其在全球市場被邊緣化，在日本、新加坡、南韓以及泰國等國的引領下，東南亞各國也透過締結雙邊及區域經貿協定，強化彼此之往來與合作，擴大整體生產及市場規模，並提升市場競爭性（Pomfret 2007, 925; Hsieh 2017, 327; Choi 2003）。

相較於1970年間區域經貿整合主要由歐、美國家所主導，且發展中國家締結之FTA數量只占全體FTA數量20%之狀況（WTO 2011, 52-56），目前南方世界國家間（South-South）累計簽署的區域貿易協定數量，已約占FTA總數的50%（Pant and Paul 2018, 539）。縱使FTA的簽署數量與簽署國貿易開放程度高低未必呈線性關係，但FTA締結數量，仍反映著締約方與他國進行經貿整合之政策方向，以及其願意在WTO承諾外進一步推動貿易自由化之決心。是故從南方世界國家締結FTA數量倍增，以及其締結對象轉變之趨勢觀察，吾等可推估在與已開發國家簽署貿易協定開拓市場並發展經濟的思維外，南方世界國家也嘗試透過與其經濟發展程度相近國家合作，共同推動產業鏈之水平與垂直整合，以提升其貿易競爭力（Baldwin and Kawai 2013, 5-6; Wang 2006, 269-270）。且隨著近年美國在經貿及政治上強調印太戰略之推動，亞太區域東南

亞國協區域經貿之快速整合，以及CPTPP和RCEP等巨型貿易協定之談判及簽署，此均顯示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國家在此第三波區域整合中的主導性地位。

亞太區域國家除了在FTA的簽署「量」上快速成長外，其開放力度之「質」也並未有所減損。其中，有別於傳統認為發展中國家對貿易自由化抱持著抗拒或敵視的刻板見解，亞洲國家在第三波區域整合階段所作之開放，其幅度亦大幅超過了其在WTO下之開放承諾（Qin 2003, 487-89; Charnovitz 2008, 917-920），而Baldwin和Kawai（2013, 8-9）所指出約77%的FTA含有超過WTO承諾程度規範之狀況，也反映了第三波區域整合態勢下，南方世界國家由保守轉趨開放的經貿思維。

本文作者認為，此一由南方世界國家締結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所形塑之國際經貿秩序，不但促成了第三波區域整合的進行，更宣告了新區域經濟秩序（New Regional Economic Order, NREO）的誕生（Hsieh and Mercurio 2019, 7; Hsieh 2017, 337-341）。

二、東南亞國協經貿整合之歷程

為了防範共產主義擴張，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等五國在1967年正式組成東協，並希望對區域內之政治、經濟及安全機制加以整合。在此一階段，由於維繫區域軍事、政治穩定，以及促進和平解決區域內爭端為東協的首要任務（Severino 2006, 1-7; Choi 2003），因此東協運作上亦以軍事安全、政治中立以及凝聚區域認同為優先（Acharya 2001, 55-77），但對於經貿整合則較少著墨。雖然東協創始五國之經濟在1970~1980年間有相當規模之成長，但此大多是因其國內各自經濟計劃之實施成果，而非區域經貿整合之功勞（Abdel-Monem 2012, 238）。

受早年受外國殖民之經驗影響，東協各國對於維護國家主權之獨立有相當之堅持，因此東協的決策機制上依循共識決原則（consensus principle），要求東協決策均需經全體成員同意始能形成。此外，對於如何將東協決策及政策落實於各成員國之問題，相較於歐盟利用歐盟法之直接效力（direct effect），使區域規範得直接在成員國境內生效並產生拘束力之硬法（hard law）整合模式（Cooper 2014, 2; Horspool and Humphreys 2012, 168-170），東協之區域整合

規範則多以不具強制拘束力之軟法形式呈現，並強調由各國通力合作之水平方式進行。此外，由於東協強調在區域組織之決議和規範不應直接干涉成員國之內國秩序，因此任何在東協下締結之協定或通過之決議，均必須經成員國依其國內程序轉化後，方能對成員國產生拘束力。

在1990年代，意識到中國和印度等區域大國崛起對東協各國經貿所產生之競爭和威脅，東協各國亦跟隨第二波區域經貿整合之浪潮，並從原先之政治、軍事合作轉聚焦於區域經貿之整合，並在1992年簽署AFTA成立東協自由貿易區時，力求降低區域內貿易關稅以刺激並擴大區域內需市場。不過由於AFTA下原產地規則過於繁複，且各成員國承諾降稅幅度不足，導致區域內外貿易關稅差異之比較利益不足（Wignaraja 2013, 4），AFTA對區域內貿易之促進並不顯著（Frankel and Wei 1998; Pomfret 2011, 25; Soloaga and Winters 2001, 23-24; Thornton and Goglio 2002, 206-208; Tan and Samtani 2002）。相對的，東協區域內較大規模且實質的經貿整合計畫，乃是2007年開展的2015東協經濟體藍圖（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2015 Blueprint，以下簡稱：AEC 2015藍圖）。

在AEC 2015藍圖下，東協區域力求在2015年時整併為單一市場及生產基地，擴大區域內市場並提升對區域外貿易之競爭力。在同一時間，東協亦透過與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澳洲、紐西蘭和印度簽署FTA並推動RCEP談判，擴大區域經貿整合（Wang 2018; MBC 2013, 2-5）。透過東協經濟體所建構的區域連結，東協十國的合作反映了新區域經濟秩序下南方世界國家整合態樣，以及其從貨品貿易、服務業貿易、投資保護，甚至是爭端解決之不同安排。

其中，東協貨品貿易協定（ASEAN Trade in Goods Agreement, ATIGA）之簽署，統整了自AFTA以來，東協各國就貨品貿易以及消弭非關稅貿易障礙所簽訂之規範。在東協服務業貿易框架協議（ASEAN Framework Agreement on Services，以下簡稱：AFAS）架構下，成員國也透過包裹式談判（package structure），分次對服務業開放做出承諾。而與服務業貿易相關的（資格）相互承認協議（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s, MRAs）以及東協自然人移動協議（ASEAN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 Agreement, ASEAN MNP Agreement），也補充了AFAS簽署後區域內技術勞工的流動需求（ASEAN 2013, 15-17）。而

東協全面投資協定（ASEAN Comprehensive Investment Agreement, ACIA），也簡化了過往各投保協定之繁雜內容，並提供投資者更周全之保護。

最後，東協在爭端解決之處理上，又依爭端是否屬經貿問題而加以區分。對於東協締約國間之經貿問題，主要依東協強化爭端解決機制議定書（ASEAN Protocol for Enhance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EDSM）處理（Ewing-Chow and Tan 2013, 23-24）；關於投資人和東協地主國間之投資爭端，則可依ACIA下投資人／國家仲裁機制處理（Cho and Kurtz 2018; Naldi 2014）。至於東協成員國間之非經貿爭端，則可依東協友好合作條約以及東協憲章之規則排解（Naldi 2014; Ewing-Chow and Yusran 2018, 365）。

肆、東協推動服務業貿易整合案例研究

東協之經貿整合策略，力求在尊重各成員國主權完整性並落實不干涉原則的前提下，強化區域內生產要素之流通性，並消弭區域內貿易之非必要障礙。雖然早年之貿易協定議題多側重於消弭關稅及非關稅障礙（ADB 2014, 120），但隨著貨品關稅在WTO之談判中大幅降低，在成立AEC目標下東協各國間貿易關稅也幾乎降低至零。相較於關稅，各國對於服務業貿易之限制和規範，反而是東協區域內之生產整合的更大阻礙。

雖然東協各國意識到開放服務業貿易對於區域經貿整合之重要性，但考量服務業貿易的開放，將會導致外國資本流入，引發區域內自然人之跨境移動，衝擊本國就業市場，影響國民就業，甚至將觸動各國學歷和專業證照資格相互承認等與主權緊密關聯之議題（Hsieh 2017, 345）。在此狀況下，南方世界國家長期對服務業貿易開放即有所抗拒，且對相關議題的談判採取謹慎之立場，此從沒有任何東協國家參與近來在WTO架構下進行的服務業貿易複邊協定談判，即可知一二。

為了了解南方世界國家在新區域經濟秩序下的經貿整合模式，以及南方世界國家如何在推動貿易開放的同時，緩解成員國對利益分享不均以及主權受限制之擔憂，並克服國內對自由貿易之反彈及抗爭，本節將以東協經濟體下服務業貿易之開放與整合為核心，分析東協各國透過開放服務業貿易，避

免國家在經濟發展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Tho 2013, 22-29; UNCTAD 2014, 15; Mann 2007），並藉以持續刺激經濟持續成長之經驗（Stephenson and Robert 2011）。此外，由於東協之成員國，涵蓋了諸如新加坡、汶萊等經濟高度發展國家，以及如柬埔寨、寮國等發展程度較低國家，因此東協在進行區域整合時，究竟如何調和並滿足各國因發展程度而衍生之不同貿易需求，並根據各成員國之發展狀況給予彈性或優惠，即值探究。

東協成員國間經濟發展程度之差異，以及其在推動經貿整合時面對之困難，與當前國際多邊經貿談判因成員國經貿發展狀況不同，而導致難以就經貿整合形成共識之困境相似。著眼於東協區域整合經驗對全球多邊體系整合的可參考性，本文希望透過分析東協之區域整合策略，探討化解南方世界和北方世界國家對經貿整合歧見之可能方法，並作為多邊經貿談判之參考及學習對象。且考量服務業貿易因涉及國內就業市場以及外國人民移入，始終係各國在開放上最為謹慎之貿易項目，故本文後續分析也將聚焦於東協在服務業貿易之整合，以東協為範例觀察觀察南方世界國家在推動開放敏感性貿易項目時，與北方世界國家策略及取逕上之差異。

一、東協服務業談判模式以及AEC 2015目標

東協區域內貿易整合在1990年代正式開展，由於東協成員國意識到服務業貿易在全球經濟日趨重要之地位，以及服務業貿易開放及整合對東協經濟發展之可能助益，1995年簽署的AFAS協議，主導了東協在第二波區域經貿整合階段服務業貿易之開放（ASEAN 2015, 11）。相較於一次到位的談判策略，東協在AFAS架構下，透過持續性的分批承諾方式，漸進地整合成員國間服務業貿易開放。目前東協各國在AFAS下，已陸續簽署十個分批承諾（AFAS 1-10 Packages），各國針對航空運輸以及金融服務另締結之協議，也進一步擴大了AFAS的覆蓋範圍，並為東協經濟體成為單一市場及生產基地奠定基礎。

AFAS的規範架構及對服務業之開放模式與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以下簡稱GATS）相似，包括了模式一的跨境服務提供、模式二之境外消費服務、模式三之商業據點呈現，以及模式四之自然人移動。考量到服務業開放，可能導致部分國家及產業之失業率上

升，甚至會因自然人之移動而導致社會之反彈及動盪，在政治上極為敏感，因此在AFAS下各國對於服務業貿易之開放承諾，和WTO之GATS相似，均採正面表列承諾模式，僅要求成員國就其載明之服務業（子）項目進行開放，對於未列於承諾表者則無需加以開放，以限縮服務業貿易之開放幅度。此外，為了加速區域服務業貿易之自由化，AFAS也鼓勵成員國跟進其他成員國在AFAS及和GATS下做出的開放承諾，並使該承諾對全體東協成員一體適用，不因其他成員國未做出相對應承諾，而給予差別性待遇。

除了前述措施外，東協為了加速其成員國對服務業貿易之開放，東協甚至例外的排除了共識決以及一體性原則，在AFAS第IV bis條下，允許成員國利用東協減X（ASEAN minus X）承諾模式。讓有意擴大其服務業貿易市場之成員國，得在全體未形成共識的情況下，先就彼此欲開放之項目進行協商並簽署協議進行開放，使東協經貿整合不因少數國家對市場開放之顧忌和反對而陷入停滯。此外，為了避免未承諾開放之成員國，得「搭便車」而同樣享受其他成員國在東協減X模式下所作承諾及優惠，東協減X模式也特別強調互惠原則（reciprocal basis）的適用，將得享有東協減X模式開放利益之主體，限縮於協議參與者，藉以鼓勵其他成員國加入協議並做出承諾，並避免有未參與整合之成員國搭便車而獲得利益。

東協在AEC 2015藍圖中，確立將區域內在2015年時整合為單一市場及生產基地之目標，並展開以消弭絕大多數服務業貿易限制（substantially all restrictions on trade in services）之計畫。東協成員國也同意優先在2010年完成對航空運輸、電子化東協（e-ASEAN）、健康照護以及旅遊服務服務之開放，並在2013年完成物流服務之開放。在AEC 2015藍圖下，東協成員也可利用東協減X模式，在全體未能達成共識情況下，在部分成員國間先行推動服務業貿易開放。

在服務業貿易之具體開放承諾上，東協成員國同意就模式一（跨境服務提供）以及模式二（境外消費服務）做完全之開放。但對較敏感的模式三（商業據點呈現）和模式四（自然人移動開放），則保留了一定的彈性，以減緩各成員國國內可能面對之社會及經濟衝擊。此外，針對模式三商業據點呈現部分，雖然AEC 2015藍圖仍允許成員國就外國投資持股比例設限，但成員國仍應逐

步將外資可持有比例從51%調升至70%，減少對外資之持股限制。

在自然人移動部分，雖然東協強調自然人移動之開放有助於單一生產基地的建立，並能促進區域發展並減少貧窮問題（Martin and Abella 2014, 33），但考量自然人移動可能涉及之國家安全、社會、就業等複雜問題，AEC 2015藍圖下僅開放技術勞工（skilled labor）類型之自然人移動，排除了低技能（low-skilled）以及無技能（unskilled）勞工之開放。此外，為了降低成員國因開放服務業貿易而可能遭受之衝擊，AEC 2015藍圖亦允許各成員國將敏感性服務業項目排除於開放之列，但為了避免此例外條款被浮濫使用，甚至導致東協服務業之整合失敗，AEC 2015藍圖亦要求每一成員國對服務業貿易限制開放之項目，不得超過其服務業貿易總額的15%。

自然人移動之開放，對東協經濟整合之成敗居核心之角色。但由於自然人移動帶來之勞動力移入現象，對各國國內就業市場將產生直接衝擊，並甚至可能因觸及移民等敏感國家安全問題，因此當前WTO以及多數的FTA對於自然人移動之開放，均較其他服務業模式更限縮（Carzaniga 2003, 23-24），並更嚴格地對開放承諾進行審查（Stephenson and Hufbauer 2011, 281-283）。

雖然東協在AEC 2015藍圖下降低了模式四（自然人移動）之開放要求，並將全面開放項目限縮於技術勞工類別。但著眼於推動自然人移動對部分後進成員國之經濟發展有所助益（ILO and ADB 2014, 33），且能解決高經濟發展成員國面臨的技術勞工缺工問題（Martin and Abella 2014, 33），因此東協仍額外透過東協自然人移動協議以及（資格）相互承認協議之磋商，促進區域內勞力資源之流通。此外，ACIA對外國投資者進入、短暫停留以及工作之規定及保障，除了促進模式三商業據點呈現發展，也同樣對自然人移動之發展有所促進（Fukunaga and Ishido 2015, 15）。

在AEC 2015藍圖下制定的東協自然人移動協議，除了將取代AFAS模式四之承諾外，其更著重於要求成員國對所有技術勞工之自然人移動進行開放，僅允許成員國保留對低技術和無技術勞工之移動限制。此外，為了避免開放技術性勞工移動演變為移民問題，並造成成員國對其開放有所顧忌，東協自然人移動協議僅要求成員國授予技術勞工非永久性（non-permanent）移動自由，並允許成員國依據各服務業類型之性質和需求，對自然人移動許可停留時間和

條件做細部性規定，並可在符合公共目的前提下，維持對移動技術勞工之簽證要求，進以限制區域內技術勞工之永久性移動狀況（Hsieh 2017, 354）。

東協除了透過自然人移動協定強化服務業貿易模式四類別之開放外，也利用締結相互承認協定，統整個成員國之技術勞工資格認定，以增加技術勞工在區域內之移動能力。須注意的是，東協的相互承認協定中，其並不要求各成員國直接承認其他會員國頒發之證照和認證，而是以透過合作機制的建立，使各成員國間對技術勞工的規範趨於一致，且成員國所締結之相互承認協定內容，也會因涉及服務業類別不同而有差異。舉例而言，在目前東協已簽訂之護理、醫療及牙醫相互承認協議中，其即著重於統整此類勞工須在其來源國取得認證、具備相關資歷之規定；但在會計及調查服務類之相互承認協議，則著重於確認各成員國間應適用會計準則之，以及強化資訊交換機制（Yue 2013, 118-119）；在旅遊服務從業人員之相互承認協議中，東協各國則對包括旅遊顧問、旅館服務員等在內之服務人員資格認證及訓練準則加以規範（ASEAN 2013, 18）。

二、AEC 2025藍圖

東協在AEC 2015藍圖下，已相當程度消除了區域內之貿易關稅，開放並鼓勵外國投資、調和並簡化對資本市場之管制架構，並以包含促進技術勞工之移動力在內之方式推動服務業貿易開放、強化區域內連結，減少各成員國間之發展差異。為了進一步促成區域內之合作與發展，並延續AEC 2015藍圖下未完成之工作，東協成員國在2015年通過了AEC 2025藍圖，擬定東協下一個十年的整合目標。

在AEC 2025藍圖中，東協成員國除了強調AEC 2025藍圖與AEC 2015藍圖之延續關係外，更強調東協的經貿整合目標將從籌建單一市場，轉為使區域內之貨物、服務、投資、資本和技術勞工移動均能順暢無阻的流通。其中，AEC 2025藍圖對於平衡區域發展關係、提升服務業貿易發展，以及強化東協在整體區域經濟整合參與之論述，又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呼應東協因應亞太金融風暴，以及中國大陸以及印度等大國崛起而開展第三波區域整合之初衷，東協在AEC 2025藍圖下，仍以強化區域經濟整

合作為因應全球經濟變化之方針。然而，在強調整合並發展區域經貿發展的同時，東協亦強調必須兼顧區域之平衡發展，並應特別協助包括柬埔寨、寮國、緬甸及越南等國家發展。其優先消除區域內貧窮狀況，以及維持中產階級穩定發展之目標，反映了東協以「發展」為本整合理念。

其次，考量東協各國在AEC 2015藍圖下，僅完成十個分批承諾談判以及部分獨立服務業開放協定之簽署，未能充分落實區域內服務業及勞動之自由化，因此在AEC 2025藍圖下，東協除了將延續AFAS下之批次協商模式，使東協各成員國能以超越WTO下承諾之幅度，開放其服務業開貿易，加速東協融入全球產業鏈之結構，促進其工業發展、創新以及效能。過往東協減X之模式也在AEC 2025藍圖下被保留，以提供成員國對服務業貿易開放之彈性。此外，透過目前已經簽署的八個專門職業相互承認協議、東協資歷參照架構（ASEAN Qualifications Reference Framework），以及東協自然人移動協定，整合區域內對於專業人士資格和能力之認證機制，東協也希望藉提升區域內技術勞工以及商務訪客之移動能力，促進區域內勞動資源的分配及運用。東協將特殊資格證明文件及資料要求之標準化及簡化之努力，也有助於促進跨境技術勞動力的移動，並能促成外國投資進入。

最後，為了因應當前全球經貿朝巨型區域整合方向發展之趨勢，東協在AEC 2025藍圖下也提出了因應之策略。其中，東協除了將優先強化區域內之整合以鞏固東協經濟上之一體性外，東協也期待成員國能在取得一致立場的狀況下參與區域及全球經貿議題討論，並透過團體之力量使對外經貿談判能獲得更有利之結果。此外，透過與包括中國、南韓、日本、印度、澳洲以及紐西蘭等在內國家締結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全面性經貿夥伴協定，東協亦將維持其在經貿上之開放以及兼容特性，並鞏固其在區域及全球事務參與之中心性（centrality），且同時支持多邊貿易之運作並拓展與全球及區域性組織之合作及接觸。

三、東協服務業整合之困境與挑戰

東協在AEC 2015藍圖、AFAS分批承諾以及東協自然人移動協議和相互承認協議的推動下，各成員國漸進地對極敏感的服務業貿易進行開放，力求使區

域內成為單一生產基地。在擬定未來十年整合計畫的AEC 2025藍圖下，東協成員國也希望更大幅度地消弭貿易障礙，使東協成為無阻礙（seamless）的貿易市場。即便東協透過多元的機制敦促並鼓勵成員國進行開放，東協服務業貿易的自由化不論在幅度或速度上均仍有不足。且東協為了因應各成員國歧異的經濟發展狀況和發展需求，所發展出之多元服務業開放承諾模式，也導致其服務業貿易承諾趨於複雜，並因適用對象及範圍分歧而有規範破碎化之疑慮。

首先，目前各國對於服務業貿易的開放，主要可區別為採取正面表列以及負面表列等二種承諾模式。所謂正面表列，指的是成員國將其願意開放的項目列出，並只對其在承諾表中列出的項目有開放義務，至於未列於承諾表的部分，國家則沒有進行開放的義務。與正面表列相對的概念，則是所謂負面表列承諾模式。在負面表列開放模式下，國家在承諾表列出的是其不願意開放的項目，至於未列在承諾表中的，則一概應予開放。在兩種承諾模式中，正面表列模式多用於開放程度較低的協定中，而負面表列則出現於開放程度較高的協定中。

目前東協AFAS下之服務業貿易開放，仍採用與WTO GATS相同之正面表列承諾模式，雖然AFAS透過十個分批承諾擴張了對服務貿易的開放項目，但從本質上觀察，AFAS和GATS對服務業貿易開放之談判取逕，仍維持「限制為原則、開放為例外」之有限開放狀態，其開放速度和幅度均有未盡人意之處。且從AFAS選擇採正面表列承諾模式觀察，我們亦可發現東協成員國希望限縮服務業貿易開放的意圖，以及其對服務業貿易開放之保守態度。

然而，由於服務業貿易的開放以及技術人才的流通，對於東協是否能成為單一生產基地以及無阻礙市場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因此東協能否透過東協服務業協定（ASEAN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ATISA）的談判，說服成員國將服務業貿易開放，改以負面表列形式呈現，屏除GATS正面表列開放模式並更積極地對服務業貿易進行開放，此對於東協能否達成AEC 2015藍圖以及AEC 2025藍圖下，消除區域內絕大多數服務業貿易限制並進行高度整合，有著決定性之影響。

其次，觀察對推動東協服務業貿易模式四（自然人移動）開放具重要影響性的相互承認協定簽署狀況可知，東協相互承認協議之談判和締結進展並不順

利。原先預定在AEC 2015藍圖下於2015年完成對「所有」服務業類別締結相互承認協定之規劃，至2019年3月為止僅完成了九個服務業類型之談判，並只有八個類型相互承認協定已正式生效（2017年在新加坡完成之航空機組員證照相互承認協議目前尚未生效）。雖然我們不應否定東協相互承認協定之談判及簽署，對東協服務業貿易開放之貢獻，但此緩慢之談判及協定締結速度，顯然與東協希望加速區域內服務業貿易開放之目標相違背，並嚴重的遲滯了東協的整合。

再者，雖然東協在AEC 2025藍圖下，希望透過ATISA之締結，將過去相互獨立存在的AFAS、AFAS下的分批承諾、自然人移動協議，以及相互承認協議進行整併，統整此些涵蓋範圍以及內容均相異的協定，簡化複雜的協定適用關係。並希望將ATISA的服務業貿易開放模式，從AFAS的正面表列承諾模式，改為負面表列承諾模式，改善東協服務業貿易開放不足之問題。不過從當前ATISA談判進度緩慢，遲遲無法獲得具體進展的狀況觀察，東協距離完全消弭區域內服務業貿易障礙，以及達成區域內服務業貿易自由化之目標，仍有相當之距離。

此外，雖然東協以多邊以及東協減X多元模式並行之承諾方式，使成員國能依各自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發展需求，以及其對開放競爭之不同耐受能力進行服務業貿易開放，但此一採取彈性化承諾模式之決定，卻也導致東協區域內適用規範日趨破碎化。特別是在東協減X模式下，雖然此機制使少數東協成員國得先行締結協議，加速對部份服務業類別之開放，但由於東協減X模式排除了區域內規範的「一體適用性」，並允許成員國對於締約者即非締約者給予差別性待遇，並導致了東協成員國間歧異待遇的出現，而各成員國間簽署多個交錯適用之協議，也將導致「義大利麵碗效應（spaghetti bowl effect）」的出現，並造成東協各成員國適用之協議趨於繁雜。

東協區域共同的被殖民歷史，以及各國共同經歷之金融危機經驗，使東協成員國在政治上始終能堅持維持區域團結和一體性之共識，以確保區域之發展和存續。然而，隨著東協內部貿易協定日趨複雜化之態勢，以及東協成員個別與他方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增加，甚或簽署CPTPP等巨型貿易協定而接受高標準之貿易規則，此均對東協內部一體性、中心性以及合作基礎，帶來嚴峻之挑

戰。其中，由於包含新加坡、越南等在內的部分國家已加入CPTPP，接受高標準之自由貿易協定規範，並與簽署歐盟等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深化與其他國家之經貿交流以加速其經濟發展。在此狀況下，倘東協其他經濟後進國家無法加快其發展速度，縮短與新加坡等發達國家之差異，隨著東協成員國發展差異逐漸拉大，未來東協內部之貿易協商及談判，自然也將面對更多的困難與挑戰，並會需要折衷地保留政策彈性空間，甚或是採行不具法律拘束效力之宣示性軟法規範敦促各國進行開放，以符合並滿足成員國不同履約能力及需求。

在現實中，雖然東協透過實施東協減X承諾模式，鬆綁了其過往堅持的規範一體適用原則，進而在不影響後進國家的狀況下，持續推動區域經貿整合。然而，考量此種承諾模式，乃是透過犧牲東協規範的一體適用性，換取部分成員國間短期之整合，此一方法未來究竟是否能擴大適用而促成全體成員的整合，又或是將造成東協成員國分裂為數個次群體，甚而拖延東協區域內經貿整合的速度，均值得特別注意。

此外，隨著東協各成員國與區域外國家簽署的FTA數量逐漸增加，東協成員國間經濟發展程度上之差異也將隨之擴大，其適用的貿易規則也將有更多的差異。這樣的發展除了可能削弱東協區域整合所產生之競爭優勢，倘東協內部遲遲無法完成整合，外部貿易協定對東協的滲透又日漸加深，此時東協各國對於「東協一體性」的認同即可能隨之弱化，甚至可能威脅東協之區域團結，並造成東協崩壞之狀況發生。

伍、結論

面對著全球區域整合以及貿易自由化的浪潮，東協透過區域內市場及生產資源的整合，維持東協區域在全球貿易之競爭力及重要性，並穩定區域之發展。東協在區域整合過程中，努力調和區域內發展程度不同國家對於貿易自由化的不同期待，並力求滿足成員國對於社會發展之不同需求，此均凸顯了南方世界國家以「促進發展」為核心政策目標。此外，雖然過往南方世界國家對於貿易自由化，有著較多的顧忌，且也常傾向利用貿易保護措施保護內國產業發展。但從東協成員國普遍能在AEC框架下，持續推動貿易開放，並能在相關

FTA中，做出超越WTO幅度之貿易自由化承諾觀察。此均顯示在適當彈性政策機制的配套，以及政治決心的支持下，南方世界國家仍對利用貿易促進社會及經濟發展有著強烈的期待及渴望，且並非對自由貿易全然採取敵視的立場。而東協在AEC 2015以及AEC 2025計畫下，對區域整合以及貿易自由化之經驗及成就，也驗證了在第三波區域整合脈絡下，南方世界國家透過締結區域協定進行整合，而形塑的新區域經濟秩序特色及成果。

然而，誠如本文前所討論，雖然在第三波區域整合過程中，東協在貿易自由化以及消弭貿易障礙之目標上已取得相當之成功，但從東協對AEC 2015藍圖執行延宕，且AEC 2025藍圖下是否能如期完成預定之區域整合目標猶未可知的狀況下，吾等也可發現東協成員國在推動區域整合及開放的過程中，逐漸因涉及議題進入深水區，導致東協後續協定之談判及執行，陷入與WTO多邊貿易協定相類似之談判遲滯問題。此外，由於東協強調採用軟法及漸進式的整合模式，且在機制上並未特別針對爭端解決或監督措施另作設計，東協所採行的漸進式區域整合，究竟是否能使成員國進行更大幅度的開放，其又是否能避免南方世界國家合作時常出現的遵約（compliance）問題，此等均是未來對東協區域整合進行研究時，應嘗試以實證角度加以檢驗之問題。

雖然東協因其特殊之歷史背景，使成員國在政治上有更高的決心推動並完成區域經貿整合，且東協在經貿整合過程中採取的非拘束性及軟性策略，也有助於成員國接納區域整合之安排，但未來東協成員國是否能化解其彼此對推動貿易自由化之擔憂及抗拒，其又是否能降低各成員國因經貿能力及發展目標不同而產生的談判齟齬和歧見，更將是影響東協區域整合成敗的關鍵因素。然而，不論東協未來經貿整合之成敗，東協成員國在面對諸多困難狀況下，其對於凝聚其成員國共識，並堅定成員國完成區域整合工作政治決心所做出之努力，對於目前因成員國嚴重分裂歧見而陷入停滯的WTO多邊貿易談判體系，均具有高度之參考意義。

隨著東協在AEC 2025藍圖下將持續推動區域之經貿整合工作，且由東協主導並有中國大陸、日本和澳大利亞等15國參與的RCEP談判已在2019年完成談判，並預定於2020年完成法律文本審核，亞太區域的區域經貿發展和整合，都將因此些貿易協議之締結和生效進入新的篇章，並將對全球經貿結構產

生重大的影響。在可預見的未來，南方世界國家間所締結之FTA，將持續推動亞太區域之經貿整合，並在促進區域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實現新區域主義下強調的貿易及發展並進模式，未來也期待此一能調和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利益及需求的經貿整合模式，能被運用於WTO等多邊貿易談判，成為建構國際貿易秩序之新藍圖。

(收件：108年9月23日，接受：109年3月25日)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ew Regionalism: The Case of Trade in Services Liberalization

Kai-Chih C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unghai University

Pasha L. Hsieh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Law,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proliferat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liberalization of global trade and the shift of the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Nevertheless, trade liberalization has also led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developing nations and developed nations and has increased the former's concerns abou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rade on development. Premised on the dependency theory, developing nations contend that increasing free trade could worsen their dependency on the developed market and undermine their economic growth.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 the Third Regionalism, also known as the latest wav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nature of contemporary FTAs has been fundamentally altered. Distinct from the conventional FTAs domina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developing countries now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shaping meg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To substantiate this argu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under the ASEAN Economic Blueprint 2025 as a case study. With a focus

on the liberalization of intra-regional trade in services, this article explains ASEAN's incremental and flexible integration model and its approach to forging the trade-development nexus for developing nations.

Keywords: New Regionalism, Dependency Theory, Free Trade Agreement, ASEAN, Regional Integration

參考文獻

- Abdel-Monem, Tarik. 2012. "Asean's Gradual Evolu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tegrating Participatory Procedural Reforms for the Environment in an Evolving Rights-Based Framework." *UCLA Pacific Basin Law Journal*, 29 (2): 234-280.
- Acharya, Amitav. 2001.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New York, NY: Routledge.
- 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4. "ASEAN 2030: Toward a Borderless Economic Community."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159312/adbi-asean-2030-borderless-economic-community.pdf> (March 16, 2020).
-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2013. "ASEAN Mutu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 on Tourism Professionals (MRA) –Handbook." https://www.asean.org/storage/images/2013/economic/handbook%20mra%20tourism_opt.pdf (March 16, 2020).
-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2015. "ASEAN Integration in Services." [https://www.asean.org/storage/2015/12/ASEAN-Integration-in-Services-\(Dec%202015\).pdf](https://www.asean.org/storage/2015/12/ASEAN-Integration-in-Services-(Dec%202015).pdf) (March 16, 2020).
-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2018. "ASEAN Key Figures 2018." <https://www.aseanstats.org/wp-content/uploads/2018/12/ASEAN-Key-Figures-2018.pdf> (March 16, 2020).
- Baldwin, Richard, and Masahiro Kawai. 2013. "Multilateralizing Asian Regionalism." *ADBI Working Paper*, No. 431.
- Bartels, Lorand. 2003. "The WTO Enabling Clause and Positive Conditionality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s GSP Progra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6 (2): 507-532.
- Bauer, P.T. 1981. *Equality, The Third World and Economic Delusion*. Cambridge,

-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hagwati, Jagdish. 1992. "Regionalism versus Multilateralism." *World Economy*, 15 (5): 535-555.
- Biermann, Frank. 2001. "The Rising Tide of Green Unilateralism in World Trade Law." *Journal of World Trade*, 35 (3): 421-448.
- Bohne, Eberhard. 2010.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Broude, Tomer. 2007. "The Rule(s) of Trade and the Rhetos of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on the Function and Aspirational Legitimacy of the WTO."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45 (1): 221-261.
- Cao, Ran. 2019. "The DSU in the Next 50 Years: Fundamental Reform or Internal Adjustment?" <https://ssrn.com/abstract=3325982> (July 11, 2019).
- Caporal, Jack. 2018. "WTO Reform: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r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to-reform-beginning-end-or-end-beginning> (July 11, 2019).
- Carl, Beverly M. 2001. *Trade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Ardsley, NY :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 Carzaniga, Antonia. 2003. "GATS, Mode 4 and the Pattern of Commitments." In Aaditya Mattoo and Antonia Carzaniga, eds., *Moving People to Deliver Services*, pp. 21-2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Ha-Joon. 2009. *Bad Samaritans: The Myth of Free Trad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Capitalism*. New York, NY: Bloomsbury Press.
- Chang, Pao-Li, and Myoung-Jae Lee. 2011. "The WTO Trade Effec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5 (1): 53-71.
- Charnovitz, Steve. 2008. "Mapping the Law of WTO Accession." In Merit E. Janow, Victoria Donaldson and Alan Yanovich, eds., *The WTO: Governance, Dispute Settlement & Developing Countries*, pp. 855-920. Huntington, NY: Juris Publishing.

- Chen, Taifeng. 2009.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vs.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 Study of Chinese Interests and Policy Options." *NUPI Working Paper*, No. 762.
- Cho, Sungjoon. 2010. "The Demise of Development in the Doha Round Negotiations."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45: 573-601.
- Cho, Sungjoon, and Jürgen Kurtz. 2018. "Legalizing the ASEAN Way: Adapting and Reimagining the ASEAN Investment Regim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66 (2): 233-266.
- Choi, Won-Mog, and Yong-Shik Lee. 2012. "Facilitating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ase for "Enabling" the Enabling Clause." *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1 (1): 1-20.
- Choi, Won-Mog. 2003.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rospect and Jurispru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6 (1): 49-77.
- Cooper, William H. 2014. "Free Trade Agreements: Impact on U.S. Trade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Trade Policy." *Congress Research Service*, RL31356.
- Craig, Paul, and Gráinne de Búrca. 2015. *EU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ypher, James M. 2014.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 Damro, Chad. 200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 Lorand Bartel and Federico Ortino, ed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the WTO Legal System*, pp. 23-42.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har, Biswajit, and Abhik Majumdar. 2010. "Learning from the India-EC GSP dispute: the issues and the process." In Gregory C. Shaffer and Ricardo Melendez-Ortiz, eds., *Dispute Settlement at the WTO: The Developing Country Experience*, pp. 174-209.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nnan, Shawn. 2015. "Trade Talks Lead to 'Death of Doha and Birth of New WTO'?" <https://www.ft.com/content/97e8525e-a740-11e5-9700-2b669a5aeb83>

- (July 2, 2019).
- Dos Santos, Theotonio. 1970.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 (2): 231-236.
- Emmert, Frank. 2003. "Labor,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nd World Trade Law." *U.C. Dav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Policy*, 10 (1): 75-168.
- Ewelukwa, Uche. 2003.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 Concept in Search of Content." *North Dakota Law Review*, 79 (4): 831-878.
- Ewing-Chow, Michael, and Hsien-Li Tan. 2013. "The Role of the Rule of Law in ASEAN Integration." *EUI Working Paper*, No. 2013/16.
- Ewing-Chow, Michael, and Ranya Yusran. 2018. "The ASEAN Trad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n Robert Howse, Hélène Ruiz-Fabri and Michelle Q. Zang, eds.,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ourts and Tribunals*, pp. 365-402.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nger, Micael. J. 2002. "The Uruguay Round North-South Bargain: Will the WTO Get over It?" In Daniel L. M. Kennedy and James D. Southwick,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E. Hudec*, pp. 301-310.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nger, J. Michael, and L. Alan Winters. 1998. "What Can The WTO Do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nne O. Krueger, ed., *The WTO a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p. 365-392.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rankel, J.A., and S.J. Wei. 1998. "Regionalization of World Trade and Currencie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J.A. Frankel, ed., *The Regional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pp. 189-226.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ukunaga, Yoshifumi, and Hirari Ishido. 2015. "Valu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ASEAN Agreement on the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ERI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ERIA-DP-2015-20.
- Goldsmith, Edward. 2001. "Development as Colonialism." In Jerry Mander and Edward Goldsmith, eds., *The Case Against the Global Economy: And for a*

- Turn toward the Local, pp. 19-34. London, UK: Earthscan.
- Grieco, Joseph. 1990.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Europe, America, 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ruszczynski, Lukasz. 2008. "The EC General System of Preferences and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in the Area of Trade - The Never-Ending Story." *Pol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8: 219-235.
- Haque, Inaamul. 2002.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Recapturing the Momentum of Multilateralism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7 (5): 1097-1130.
- Heidrich, Pablo. 2013. "Assessing the Relevance of the WTO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Hany Besada and Shannon Kindornay, eds.,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pp. 189-212.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Hoekman, Bernard. 2005. "Operationalizing the Concept of Policy Space in the WTO: Beyond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8 (2): 405-424.
- Hoekman, Bernard, and Michel M. Kostecki.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WTO and Beyon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ekman, Bernard. 2011. "Proposals for WTO Reform: A Synthesis and Assessment."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No. 5525.
- Horspol, Morgot, and Matthew Humphreys. 2012. *European Union Law*.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wse, Robert. 2004. "Mainstreaming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Policy at the World Trade." Paper presented at United Nation Human Right Commission, High-Level Seminar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Geneva.
- Hsieh, Pasha L. 2017. "Reassessing the Trade – Development Nexu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The Paradigm Shift in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 37 (3): 321-370.
- Hsieh, Pasha L., and Bryan Mercurio. 2019. "ASEAN Law in the New Regional Economic Order: An Introductory Roadmap to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In Pasha L. Hsieh and Bryan Mercurio, eds., *ASEAN Law in the New Regional Economic Order: Global Trends and Shifting Paradigms*, pp. 3-21.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dec, Robert E. 1987.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GATT Legal System*. Brookfield, VT: Gower, for the Trade Policy Research Center, London.
- Hunter, J. 2003. "Broken Promises: Agricultur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TO."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 299-322.
- Ikenberry, G. John. 2001.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LO and ADB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4. "ASEAN Community 2015: Managing Integration for Better Jobs and Shared Prosperity."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42818/asean-community-2015-managing-integration.pdf> (March 16, 2020).
- Islam, M. Rafiqul. 1999.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Pyrmont, Australia: LCB Information Services.
- Jawara, Fatoumata, and Aileen Kwa. 2003. *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WTO: The Real Worl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Negotiations/Lessons of Cancun*. New York, NY: Zed Books.
- Joseph, Sarah. 2011. "The WTO,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In Sarah Joseph, ed., *Blame it on the WTO?* pp. 142-180.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rasner, Stephen D. 1991. "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 *World Politics*, 43 (3): 336-366.
- Kulovesi, Kati. 2011.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Challenges of the Environment, Legitimacy and Fragmentation*. Frederick, MD: Wolters Kluwer Law & Business.

- Kurihara, Yutaka. 2011. “The Impact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Modern Economy*, 2 (5): 846-849.
- Lee, Jaemin. 2017. “A More Widely Available Public Good: Proposed DSU Reform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Developing Members.” *Journal of World Trade*, 51 (6): 987-1019.
- Lichtenbaum, Peter. 2002. “‘Special Treatment’ vs. ‘Equal Participation’: Striking a Balance in the Doha Negotiations.”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7: 1003-1044.
- Mann, Catherine L. 2007. “Technology, Trade in Services and Growth.”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587.4967&rep=rep1&type=pdf> (July 2, 2019).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Helen V. Milner. 1999.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 (3): 589-627.
- MBC (Makiti Business Club). 2013. “A Powerhouse Merger in RCEP.” <https://mbc.com.ph/2013/07/04/mbc-research-report-no-110-august-2013/> (March 16, 2020).
- Martin, Antoine, and Bryan Mercurio. 2017. “Doha Dead and Buried in Nairobi: Lessons for the WT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Policy*, 16 (1): 49-66.
- Martin, Philip, and Manolo Abella. 2014. “Reap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 of Labour Mobility: ASEAN 2015.” <https://ideas.repec.org/p/ilo/ilowps/994865213402676.html> (March 16, 2020).
- Mason, Amy M. 2004. “The Degeneralization of the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 Question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U.S. GSP.” *Duke Law Journal*, 54: 513-548.
- Matsushita, Mitsuo, Thomas J. Schoenbaum, Petros C. Mavroides and Michael Hahn. 2015.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aw, Practice and Polic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chalopoulos, Constantine. 2000.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GATT and

- the WTO: The Role of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Policy Working Papers*, No. 2388.
- Mossner, Louise Eva. 2014. “The WTO and Regional Trade: A Family Business? The WTO Compatibility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Non-WTO-members.” *World Trade Review*, 13 (4): 633-649.
- Naldi, Gino J. 2014. “The ASEAN Protocol on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An Appraisa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5 (1): 105-138.
- Olivares, Gustavo. 2001. “The Case for Giving Effectiveness to GATT/WTO Rule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LDCs.” *Journal of World Trade*, 35 (3): 545-552.
- Oxfam. 2002. *Rigged Rules and Double Standards*. Boston, MA: Oxfam International.
- Panitchpakdi, Supachai. 2001. “The Evolving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in the New Millennium.” *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33 (3/4): 419-449.
- Pant, Manoj, and Anusree Paul. 2018. “The Role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Case of India.”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33 (3): 538-571.
- Pham, Hansel T. 2004.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WTO: The Need for More Mediation in the DSU.” *Harvard Negotiation Law Review*, 9: 331-390.
- Picker, Colin B. 2005.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v. The WTO: A Proposal for Reform of Article XXIV to Counter this Institutional Threa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26 (2): 267-319.
- Pomfret, Richard. 2007. “Is Regionalism an Increasing Fea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World Economy*, 30 (6): 923-947.
- Pomfret, Richard. 2011.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Why Has it Flourished Since 2000 and how Far Will it Go?* Hackensack, NJ: World Scientific Pub. Co.
- Powell, Robert. 1999.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rebisch, Raúl. 1962.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7: 1-22.

- Prebisch, Raúl. 1964. "Towards a New Trade Policy for Development." In 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Natio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 Qin, Julia Ya. 2003. "'WTO-Plus' Obliga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egal System: An Appraisal of the China Accession Protocol." *Journal of World Trade*, 37 (3): 483-522.
- Roessler, Frieder. 1998. "Domestic Policy Objectives and the Multilateral Trade Order: Lessons from the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 (2): 512-534.
- Rolland, Sonia E. 2012. *Development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e, A.K. 2004. "Do We Really Know that the WTO Increases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 (1): 98-114.
- Schott, Jeffrey J. 2000. "The WTO After Seattle." In Jeffery Schott, ed., *The WTO After Seattle*, pp. 3-40.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Sen, Rahul. 2006.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merging Regional and Bilateral Trading Agreements involving ASEAN, China and India." *Journal of World Trade*, 40 (4): 553-596.
- Severino, Rodolfo C. 2006. *Southeast Asia in Search of an ASEAN Community: Insights from the Former ASEAN Secretary-General*.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Shell, G. Richard. 1996. "The Trade Stakeholders Model and Participation by Nonstate Partie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5 (2): 725-754.
- So, Alvin Y. 1990.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Dependency, and World-System Theorie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 Soloaga, Isidro, and L. Alan Winters. 2001. "Regionalism in the Nineties: What Effect on Trad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2 (1): 1-29.

- Stephenson, Sherry, and Gary Hufbauer. 2011. "Labor Mobility." In Jean-Pierre Chauffour and Jean-Christophe Maur, eds.,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A Handbook*, pp. 275-30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Stephenson, Sherry, and Maryse Robert. 2011. *Evaluat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to Governance of Services Trade. ADBI Working Paper*, No. 307.
- Subramanian, Arvind, and Shang-Jin Wei. 2007. "The WTO Promotes Trade, Strongly but Uneven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2 (1): 151-175.
- Switky, Bob. 2000. "The Importance of Trading Bloc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In Bart Kerremans and Bob Switky, eds., *The Political Importance of Regional Trading Blocs*, pp. 13-53.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 Tan, Lay Hong, and Anil Samtani. 2002. "The Shifting Paradigm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ASEAN Perspective."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25484 (March 19, 2020).
- Tho, Tran Van. 2013. "The Middle-Income Trap: Issues for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DBI Working Paper*, No. 421.
- Thornton, J., and A. Goglio. 2002. "Regional Bias and Intra-regional Trade in Southeast Asia."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9 (4): 205-208.
- Tomz, Michael, Judith L. Goldstein, and Douglas Rivers. 2007. "Do We Really Know that the WTO Increases Trade?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5): 2005-2018.
-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4. "Services: New Fronti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tctncd2013d4_en.pdf (July 11, 2019).
-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7. "Non-Tariff Measures in Mercosur: Deepen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Looking Beyond."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tctab2016d1_en.pdf (July

- 11, 2019).
- Wang, Jiangyu. 2006. "China, India,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sia: The Policy and Legal Dimensions." *Singapor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0: 269-305.
- Wang, Jiangyu. 2018. "Between Powe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sian Regionalism i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U.S.-China Trade Relations." *Pac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30: 383-439.
- Watal, Jayashree. 2000.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ests in a 'Development Round'." In Jeffery Schott, ed., *The WTO After Seattle*, pp. 71-83.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Whalley, John. 1999.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 the Millennium Round."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Working Paper*, No. 30.
- Wignaraja, Ganeshan. 2013.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Enterprises in Southeast Asia." *ADBI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422.
- Wilkinson, Rorden. 2018. "Past as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Prelude: Reconfiguring Debate about Reform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Third World Quarterly*, 39 (3): 418-435.
- Williamson, John. 2008.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In Narcis Serra and Joseph E. Stiglitz, eds.,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considered: Toward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pp. 14-30.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1. "World Trade Report 2012, The WTO and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From Co-Existence to Coherence."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anrep_e/world_trade_report12_e.pdf (March 16, 2020).
-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9.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Facts & Figures."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tajul_dec19_e.pdf (March 16, 2020).

- Yue, Chia Siow. 2013. “Free Flow of Skilled Labour in ASEAN.” In Sanchita Basu Das, ed.,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Scorecard: Performance and Perception*, pp. 107-135.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Yusuf, Abdulqawi A. 1980. “Differential and More Favourable Treat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GATT Enabling Clause.” *Journal of World Trade Law*, 14 (6): 488-507.